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 CN 65-1039/G4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经济双循环视域下的需求侧改革  
作者: 金碚  
DOI: 10.14100/j.cnki.65-1039/g4.20210125.001  
收稿日期: 2021-01-16  
网络首发日期: 2021-01-26  
引用格式: 金碚. 经济双循环视域下的需求侧改革[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10125.001>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需求侧改革专题策划(一)

# 经济双循环视域下的需求侧改革

金 砢<sup>1, 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06; 2. 郑州大学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需求”实质是由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发生的人类经济行为及其概念定义。新形势下的需求侧改革,“量”的调节不是重点,投资和消费的“质”才是政策关切的要点。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不仅要有需求量的扩展,更要重视需求侧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机制的转型趋势,进而适应整个社会的关切取向变化。中国已经具备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越来越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特征,在体制机制上已打通需求侧的各环节,使需求侧市场空间更为畅通和扩展,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主题。需求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机制问题。需求侧改革不仅涉及市场交易层面,而且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由于货币本身的高流动性,加之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作为需求侧力量的货币将发挥极大的市场效应,当货币在国内国际循环体系中大规模流动时,其经济能量和风险将同时增大和集聚。因此,实质性需求不足和工具性需求泛滥,都是需求侧改革所面临的和要应对的重大问题。如何以适当的工具性需求操作促进实质性需求,尤其是实质性消费的持续增长,是现代成熟市场经济需要求解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求侧改革;投资和消费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1)05-0007-10

注重需求侧改革,是2020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个政策取向的新意向。这是我国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态势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所作出的判断和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进行需求侧改革,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理论理解,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讨论。

## 一、需求侧的内涵及其主要关切

人对现象的认知通常以一定的视域为前提,一定的视域决定了其对概念的定义。经济学和经济分析使用最多的概念为“供给”、“需求”。但假如没有货币,就不存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由于在现

实中存在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或者交换过程须有货币为中介来实现,才使供给和需求相分离从而可以进行定义,即有“买”和“卖”的行为相对性及交易者的身份区别(买家与卖家)。买为需求,卖为供给。但是,即使有货币介入,实际发生的买卖关系也是一体的,一方的买就是另一方的卖,一方支出的货币额等于另一方收入的货币额,两者恒等。所以,统计方法中以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所得的数值也是相等的。所谓“供求不平衡”,即供大于需或需大于供,是在交易尚未发生而有意愿的情况下,“想买”与“想卖”之间的不相等。即“事前”的供求(交易意愿)可能不等,但“事后”的供求(实际发生)总是相等的。前者可以理解为“买卖未成”,后者即“买卖成交”。但是,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关切因素,即

收稿日期: 2021-01-16

作者简介: 金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人只有就业才能维持生计，无论市场交换中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如何，如果在一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有较多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未能就业，即发生“非自愿”失业现象，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这就成为经济学特别关切的问题。所以，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劳动力能否充分就业这一问题，这实际上是宏观调控即政府实施需求管理的核心目标。从这一意义上讲，市场供需失衡，实质是针对于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而言的。

以上论述表明：就经济学所定义的概念而言，“需求”现象实质上是由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而发生的人类经济行为及其概念定义。简言之，用货币“购买”产品，或货币的“支出”行为即定义为“需求”，与之对应的即为“供给”。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把“需求”高度抽象化和形式化，把所有的需求加起来，成为需求的总量，即“总需求”，其体现为一定的货币支出量。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对货币总量以及意愿或实际发生的“购买”行为进行调节，称之为“总需求政策”。

将需求总量分解开，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支出量就是宏观经济学定义的“消费”，购买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量定义为“投资”，外国人支出货币进行的购买称为“出口”。按此定义，总需求就等于“消费+投资+出口”，即总需求“三驾马车”。要使生产的产品，即意愿的“供给”都能实现，需将其卖出，被称为“市场出清”。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购买行为都由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和企业）自主决策，而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因而宏观政策被视为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政府也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即财政支出调控需求量。如此，总需求调控就表现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经济干预，即需求侧管理的基本原理或理论构想。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注重需求侧改革”，这显然不是简单地着眼于宏观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政策的一般原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通常考虑，而是针对当前的新形势，着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在新形势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因此，尽管对于总需求量的调控是需求侧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其明确强调的是

需求侧的“改革”意涵。另外，还需关注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表述上的差别，前者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者称“需求侧改革”。两者都落脚于“改革”，但前者强调了“结构性”，那么，后者强调的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以公式表达：供给=消费+储蓄；需求=消费+投资。因此，从宏观总量关系看，要实现“供给=需求”，就要实现“储蓄=投资”。

如果是开放经济，国际贸易平衡状况也与“储蓄=投资”的平衡关系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大于投资，通常会出现贸易顺差；如果储蓄小于投资，通常会出现贸易逆差。当前，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即中国有大幅度顺差，而美国有大幅度逆差，同这一宏观平衡关系直接相关。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需求结构，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间的比例具有显著特点。在总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上，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消费比重明显偏低。2019年，中国的消费率为55.4%，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为78.1%，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73.9%。从供给侧看，该数据意味着我国储蓄率较高。如前所述，由于“储蓄=投资”才能实现总体平衡，所以，我国的宏观经济特征表现为较高的投资率和国际贸易顺差。

对于我国经济向着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方向迈进，实际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事实，举凡经济大国大都如此。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实行封闭式的发展模式，基本属于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转向国际大循环，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截至2006年，我国的国际循环比重达到较高水平。出口总额占GDP之比达36%以上，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64.5%。此后，这一比重开始下降，到2019年，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7%，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35.7%。期间，经常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2007年的10%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可以判断，今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这一趋势已经出现，疫情之后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实际上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经验性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



此，我们对于经济双循环的关注不是量的简单比例关系，而是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即国民经济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根本性问题。

由此可知，既然需求侧改革并不特别强调结构性问题，那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储蓄率和投资率高的特点（即人们常常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热议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本身不是主要关注问题，政策重点也不会对两者的比例进行大幅度调整，而是加快向国际“常态”收敛。新形势下的需求侧改革，重点不是“量”的调节，投资和消费的“质”才是政策关切的要点。

## 二、“投资”的内涵及总量与质量

如前所述，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学术框架中，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中所定义的“投资”属于需求侧，可以加总成为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投资”有多种含义，可以表达不同定义下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研究“投资”问题时，须明确是在哪一个含义上进行的讨论。

第一，“投资Ⅰ”，其概念含义为：货币支出，购买生产要素所支出的货币量就是需求量。这是交易意义上的投资“需求”，即在实质经济活动中，以货币支出换取生产要素或相关生产条件。

第二，“投资Ⅱ”，其概念含义为：实现“资本形成”或进行“积累”，即创造生产能力或条件，进而创造“产出”（产品），即为狭义的“生产”过程。因此，“投资Ⅱ”的概念含义与“供给”的概念相连接，实际脱离了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定义的“需求侧”而跨入“供给侧”。除了进行宏观经济的总量分析外，在大多数关于经济活动的质态研究中，都在这一含义上使用“投资”概念，接近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或资本创造）理论意义。

第三，“投资Ⅲ”，其概念含义为：人力资本增加（主要表现为生产者素质技能的提高），通常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概念含义与“投资Ⅱ”及“消费”相连接，成为跨供需的概念。即从生产组织（企业）角度看是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性质相同；而从个人角度看，表现为自身的消费（发展性消费）。因为，在现代经济中，劳动者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实际是劳动力的技能形成和积累。

如前所述，在宏观经济的传统范式框架中分析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关注的是投资所形成的需求量（“投资Ⅰ”），特别是当供给能力（产出量）过剩、产品大量滞销、失业率较高、物价下跌时，以刺激民间投资和增加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政策调节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至于投资哪些产业，投资效率如何，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政策着力点在于增加总需求，即扩大“投资Ⅰ”的总量。正如凯恩斯主义者所言，可以设想：雇一批工人挖坑，再雇一批工人把坑填上，就把“投资”搞上去了。从形式化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看，这确实可以增加总需求，却是不合理的。不过这也可以表明，对于总需求的宏观调控而言，投资量是主要的政策关切点，着眼于投资量可以发挥短期效果，而如果着力于投资的质态，则“远水不救近火”。

但我国的现实情况与此不同，我国对投资总量的调控（增加）不难把握，但投资的“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难题，存在许多需要提升和改革之处。例如，投资的市场化决定机制不完善，往往不能很好地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要求。在政府投资规则、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和民间投资激励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体制机制缺陷。特别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如何顺畅地与国际规则接轨，还有许多改革和政策调整上的“硬骨头”要啃。尤其是政府采购机制、国家对企业投资的补贴方式、投资政策透明度、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深度改革。这些需求侧改革，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需求侧改革也必将提上日程。2020年年底，经过7年谈判的中欧投资协议签订，这是一个推动中国投资质量提升的重要改革进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需求侧改革在投资领域中，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机制变革的一个里程碑，体现了投资质态改善更受关切的国家战略意志。

从需求侧观察，投资的质量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投资资金的可获得性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公平性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例如，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还是向民营企业贷款，其风险责任，包括个人（贷款决定人）的风险责任，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情况下，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责任风险性明显高于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一般而言，虽然国有企业的信誉可能高于民营企业，但制度上的“歧视”不利于投资质量的整体

性提高：偏低的利率和贷款门槛不利于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效率；高利率或贷款门槛过高会使民营企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不利于其发展。而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并非易事。

从需求侧观察，涉及投资质量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投融资）体制中，直接融资的质量较低，某些情形下又存在较强的投机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进行投机性交易，无法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实际上就是大量储蓄没有真正转化为投资，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需求。这显然不是需求总量的调节问题，而是深化改革问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中流转所获得的利润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留在金融系统中获利便成为“理性”选择。据世界银行估计，2020年，中国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GDP的3.4-3.5倍（2019年为3.21倍）。如果体制机制支持这样的“经济理性”，显然不利于投资质量的改善。

在概念含义上，“投资Ⅱ”属于经济学所定义的供给侧，“投资Ⅱ”的结构直接体现为产业结构。当产业结构不合理时，实际上是“投资Ⅱ”的结构不合理。而在经济动态过程中，“投资Ⅱ”在很大程度上由“投资Ⅰ”决定。当然，“投资Ⅰ”也受到产业结构现实状况的影响，不能脱离“投资Ⅱ”的结构要求而盲目决策。因此，尽管需求侧改革首先要关注需求侧的“投资Ⅰ”，但从对投资质量的关切出发，要高度重视更体现供给侧结构的“投资Ⅱ”领域中的质态状况。总之，当特别关切投资的质量时，需要对“投资Ⅰ”、“投资Ⅱ”以及“投资Ⅲ”进行综合考虑，系统施策。

### 三、“消费”的性质与质量

在经济学意义上，“消费”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实质上是多个概念共用的一个词语。如前所述，在微观-宏观范式框架内，“消费”的经济学性质是购买，即货币的支出，用以交换可以用于个人使用的物品或服务。而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本原意义上，“消费”是指个人对物品或服务的使用、享用过程。例如，在前一意义上，购买食物就是“消费”，至于购买以后是吃还是不吃，不必关注。而在后一意义上，吃食物就是“消费”，至于食物是购买的还是自己生产的，没有区别。前者的含义是交易行为，后者的含义是使用（享用）过程。

从交易行为的经济意义说，消费更多是积极的（除非发生物资短缺的特殊情况），这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活跃。但是，如果考虑到购买物品后的使用状况、如何使用，交易意义上的消费如果超过实际使用的消费需要——购买后并未使用——就会被认为是金钱的“浪费”。然而，即使承认购买行为未必总是理性的，只要购买力允许，更多的消费支出不仅可以产生购买的愉悦，而且从扩大市场需求的角度说，作用也是积极的。在经济循环中，一些人多支出就有一些人多收入，消费支出意愿强烈意味着经济活动的繁荣。

从使用的意义上说，如果消费行为耗费物质资源，就意味着资源的消耗；如果一方面消耗了资源，另一方面又没有合理使用，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加交易意义上的“消费”，而且有人多支出就有人多收入，未必不经济（这里的“经济”意味着“收益”）；但从使用的意义上看，这样的消费是不经济的，因为，经济学以假定资源稀缺为前提，“经济”意味着节约资源。换言之，在经济繁荣的取向上，交易意义上的“消费”通常值得鼓励（除非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而使用意义上的“消费”则提倡节约。前者有助于扩大市场，加快经济循环，后者体现资源的有效使用，二者都是经济学所关切的问题。两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实际上是由“消费”概念多重含义所导致的不同视角图景。

除上述两种不同含义之外，“消费”这一用语还表示“生产”的含义，称为“生产性消费”，即作为生产过程的消费行为。生产性消费在经济学分析中一般不计入“消费”，尽管其可以表现为个人使用，例如，吃工作餐、穿工作服、使用个人用具，以及使用交通通信工具，等等。同样是开车、乘车、通信，为私用叫“消费”，为工作而用就是“生产性消费”，归之为“公用”，不属于经济学分析中的“消费”之列。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消费”这一用语实际上常常表达三种不同含义的概念。

第一，市场交易意义上的消费，称为“消费Ⅰ”，其概念含义为：支出货币购买生活用品（消费品）或个人服务（消费服务）。这是最基本的交易意义上的“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交易完成后，是否使用所购买之物或享用已支付货币的服务，并不重要，经济分析中假定或默认其会被购物者使用。

第二，使用消耗意义上的消费，称为“消费Ⅱ”，



其概念含义为：物品或服务的使用。这是产品效用（功能）的实现，是经济活动（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真实意义所在，通常被强调为“最终消费”。

第三，生产过程中的消费，称为“消费Ⅲ”，其概念含义为：生产性消费。在物质形态上，与“消费Ⅱ”相似。但在经济关系上，被视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可以直接与“供给”概念相连接。例如，“工作餐”或“工作服”同私人消费用餐和穿衣究竟有怎样的区别？为此而支出的货币（购买行为）属于“消费Ⅰ”还是“投资Ⅰ”，完全取决于具体财务制度的设计。一般而言，在定义上，由生产者支付即为“投资Ⅰ”，由消费者支付则为“消费Ⅰ”。

与之相应，在经济关系上，“消费Ⅱ”也与“消费Ⅲ”及“投资Ⅲ”的概念相连，但在物质过程中往往难以将其明确区分。个人消费与“生产性消费”及“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形态和物质过程非常相似，只是在经济关系上可以进行性质区别，而这往往是主观的或制度性的规定。

尽管投资与消费具有相当复杂的含义，但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下，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消费Ⅰ”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它是“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政策意向强调需求的重要性时，往往意指消费需求。如上文提及的，在大多数国家的总需求中，消费率一般要超过70%。易于理解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考虑家庭自给自足的非市场性消费行为，则“消费Ⅱ”的来源是“消费Ⅰ”，即进行消费支出（购买）才能有用于消费的产品或服务。而“消费Ⅰ”的来源由有关经济主体（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决定；购买力由收入决定，即获得收入才能有支出能力（这里暂不考虑借贷行为）。由于“消费Ⅰ”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可支配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机制规则决定了“消费Ⅰ”的量及其分布。

获得可支配收入后是否会形成“消费Ⅰ”，取决于居民如何安排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中的比重。如前所述，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重要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的长期谨慎倾向，特别是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负担，压抑了当期“消费Ⅰ”。

从经济理论上说，消费质量的首要问题是收入

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保证“消费Ⅰ”的稳定增长，是需求侧改革须关注的重要内容。

消费质量提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Ⅱ”对“消费Ⅰ”具有拉动作用。从人类的本真价值理性说，“消费Ⅱ”是经济生活及生产活动的最根本目的。“消费Ⅱ”越丰富，“消费Ⅰ”越具动力。“消费Ⅱ”与“投资Ⅱ”在经济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尽管它们都属实质经济范畴，但“投资Ⅱ”具有工具性，即并非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是追求最终目的的手段。反之，由于“消费Ⅱ”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以人的实际需要和生理、心理需求满足为准则，而人的需要和满足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物质性的、精神性的和社会性的；有物质资源消耗性的，也有非物质资源消耗性的。因此，“消费Ⅱ”对“消费Ⅰ”的拉动作用具有丰富性等特性。或者说，丰富的“消费Ⅱ”才具有对“消费Ⅰ”的持续支撑力和拉动力。能够体现高质量的“消费Ⅱ”和“消费Ⅰ”的增长，才是积极健康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现。这是进行需求侧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关乎政策安排的科学性，也直接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本真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关系<sup>①</sup>。

#### 四、从欠发达向成熟阶段转变中的需求侧改革

在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框定的经济图景中，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消费Ⅰ”和“投资Ⅰ”的定义范围内进行总需求分析。对消费与投资的其它概念含义及其所表达的经济行为进行抽象，实际脱离了经济现象的时空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质态特征。如前所述，消费与投资的其它概念含义具有供给侧及跨供需的经济学性质，并非拘泥于经济学定义所框定的需求侧领域（见表1）。而需求侧改革则是一个以时空为转移的现实问题，必须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观察和研究。

因而在讨论需求侧改革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性特征。我国提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所

<sup>①</sup>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金碚：《新盛时代，本真复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表1 供需相关概念的经济学含义

需求侧	供给侧	跨供需
投资 I：购买生产要素	投资 II：资本形成	投资 III：人力资本投资
消费 I：购买产品	消费 II：效用实现	消费 III：生产性消费
出口：国外购买	进口：国外输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作出的形势判断和战略抉择<sup>①</sup>。“新发展格局”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从欠发达阶段转向成熟阶段的发展格局，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格局。

一个国家在欠发达时期，经济格局和经济机制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就需要有推动力量，一是要有高于以往的储蓄，由储蓄支撑投资。为此，或者依靠国内积累（低消费，高储蓄），或者依靠引进外资；二是要有市场，当国内收入水平低、市场需求规模小时，就要依靠国外市场，即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上述的经济格局和增长路径，加快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摆脱了经济落后的状态，相当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大推进”作用下的“经济起飞”。

当经济发展越过欠发达阶段，向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转型时，经济发展格局必然要发生显著变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国内消费需求将成为拓展市场空间的主要动因，因而必须扩大内需，使强大的国内市场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而且，经济水平从低收入提升为中高收入，消费的质量提升将比单纯的数量增加更关键。如前所述，“消费 II”的性质本身具有丰富性，因此，中高收入阶段的消费不仅是相对于低收入阶段的“量”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质”的变化，即消费形态和内容的丰富性大大提高，消费行为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边际效用递减”会形成量的单纯增长的障碍，但质的提升才能实现突破。

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势必进行消费政策的新安排，例如，以安全性制度安排（社会保

障制度）改变国人消费行为的过度“谨慎”偏好，适当降低储蓄率，促进当前消费。一方面要节约资源耗费性消费，另一方面要鼓励体验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智力消费）。而且要为必需服务消费（育儿、保姆、护理、养老等）提供政策支持<sup>②</sup>，即相当于社会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将“生产性消费”或私人消费转化为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共性消费，将非市场消费转变为市场化消费，具有创造生产要素和扩大市场需求的双重积极作用，是提升消费质量的重要标志。可以理解为，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可以有条件地将过去的供给侧行为（包括需要做而无法做到的供给侧行为）转变为需求侧行为，通过市场决定实现，由家庭和政府分担，将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性消费社会化，以扩大消费市场的规模并提升其丰富性。考虑到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求侧改革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

由于经济发展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提升，不仅仅是经济活动量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因此，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说，不仅要有需求量的扩展，更要重视以需求侧改革适应经济体制机制的转型趋势，进而适应整个社会的关切取向变化。在低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需求侧体制机制的主要关切取向是提升效率。接近中等收入阶段时，对公平目标的关切有所提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发展阶段，对安全的关切取向显著提升。环境生态安全、健康卫生安全、社会秩序安全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即人类对于生活质量的各方面关切越来越高，“消费需求”的质量含义发生深刻变化。此时，需求侧改革的领域大为拓宽，适应需求侧变

① 金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征程》，《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② 满足“必需服务消费”的劳动，过去被视为低级劳动，大多只能由家庭成员自助完成。实际上，这些消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第一需要”，即使没有市场供应，也必须得以满足，是最重要的“消费 II”需要。只是在经济发展低水平时期，无法以可接受的市场价格而形成现实需求。



化的产业发展也会形成新格局。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供给体系归根结底发挥两个作用：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sup>①</sup>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使供给侧机制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发挥资源有效配置和创造更大价值的作用。那时，需求体系主要发挥经济价值实现的作用。由于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现是价值创造的条件，因此，在经济学上一直存在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的争论。市场经济运行遵循循环流转性机理，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不仅互为条件和前提，而且如本文所述（见表1），两者在循环中不断变换角色，难解难分。

既然需求体系的根本作用是价值实现，那么，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需求侧改革的着眼点要有助于经济循环过程的畅通性。需求侧畅通，才能保证供给侧的正常运行。如果需求侧循环阻塞，就会导致供给侧的产业链风险。因此，改善市场环境，避免市场竞争机制失灵而导致的消费者受损，进而破坏正常的消费行为，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国际循环畅通性的角度看，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积极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抉择，也是必由之路。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越来越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特征，在体制机制上打通需求侧的各个环节，使需求侧市场空间更为畅通和扩展，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主题。

## 五、需求侧改革中的价格机制问题

前文主要集中于对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以及作为总需求组成部分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质量问题的探讨。我们需要明确需求量总是与一定的价格相关，离开价格，需求量无法确定。正如经济学家所言：“经济学理论中的需求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价格和人们想购买的数量。对任何物品，你都

不能说需求的是一个数量。需求总是一种关系，把不同的价格和人们在不同的价格下愿意购买的数量联系起来。”<sup>②</sup>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最基本的调节信号，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所以，需求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机制问题。

由于价格机制的重要性及其在市场调节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定，完全自由的价格调节是最好的机制，政府干预价格自由决定的任何行为，都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如果市场价格完全自由放任，所有的供需关系即买卖成交都是自愿的，那么，需求的确定也就完全随行就市。这样的价格机制在完全抽象的意义上似乎是完美的，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神话”，在现实中它是否真的有效、合意？需求侧改革在价格机制方面的作为是否只要自由放任就可以？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价格调节受到各种情况的干预。哪些干预是必要的，哪些干预是不必要的、无效率的？进行需求侧改革，如何处理价格机制问题？本文择其要者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就国内市场的价格机制现状而言，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40余年，凡是完全放开不会产生较大负作用的价格基本都已放开，由市场进行自由调节。但是，也有一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仍然受到行政性限制，例如，限购、限价，以及实行特殊的定价机制，等等。但凡干预或限制价格，必然会影响需求。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避免市场风险或供求投机，进行行政性限制有一定的原因，但限制和干预的负作用也可能较大。当价格干预所要应对的问题缓解后，有必要取消或调整限制措施。当然，如何才能恰到好处，是需求侧改革要应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前在一些领域中出现的市场垄断新现象，发生于网络型产业，特别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从经济学理论而言，凡是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由于规模扩大、成本下降，大企业对于小企业的规模优势可以把后者排除出市场，甚至形成独家垄断的局面。这样的市场结构显然不合理，有必要进行反垄断管制。问题在于当前科技高度发达，新产业、新商业

① 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② [美]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马昕、陈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4页。



模式、特别是跨业经营的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如何把握市场监管和管控力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考虑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格局，以及某些高科技产业的特殊性，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为市场管制提供理论支撑）和传统的反垄断措施，难以适应新情况、应对新矛盾。在这方面，需求侧改革必须进行创造性努力和新制度安排。

关于与价格相关的政府补贴。在经济运行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向不同的个人或经济体提供补贴是常见现象，这也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方式之一。对消费者个人补贴，可以直接形成个人的消费需求，一般不影响市场竞争。而对企业提供补贴，则可能影响产品成本从而影响产品价格。这就可能会影响（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帮助其以较低的价格占领市场。对于非竞争性产业，尤其是基础设施产业，政府补贴一般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而对于竞争性产业而言，政府补贴就必须考虑价格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而产生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中，这也是有关各方关注中国体制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加入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应对的一个涉及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硬骨头”。由此可见，需求侧改革不仅涉及市场交易层面，而且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甚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如何同世界市场衔接的重大问题。

## 六、需求侧改革中的货币流转调控

讨论需求侧改革不能不研究货币因素，如前文所述，所谓需求及供需关系，本质上是货币因素介入后产生的现象。如果不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自给自足或物物交换，供需概念难以定义，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因供需失衡或供需不等而发生的经济运行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雷·N·罗巴斯特在《人，经济与国家》一书中写道：“市场上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范围，无限扩大了所有产品的市场，使得一个文明的有生产力的社会成为可能。”“现代社会的整个模式

建立在货币的使用的基础上，货币的使用极其重要，随着分析深入，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有些作者想只分析直接交换来阐述现代经济学学说，然后在分析的最后某处引入货币，便以为大功告成，他们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直接交换分析只有作为间接交换社会分析的引导性的辅助才是有效的；直接交换社会的市场或生产的范围都极为有限。”<sup>①</sup>他所说的“间接交换”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离开对货币作用的观察，就无法理解市场经济，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货币的贮藏功能，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与货币”中写道：“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sup>②</sup>马克思已深刻认识到货币因素可能在需求侧所反映的经济运转受阻现象，而且明确指出这是货币贮藏职能所导致的现象。可见，马克思的论述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当前，关于需求侧改革的研究必须要深入观察与货币因素直接相关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要从货币流转的视角理解经济体需求侧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过去主要关注供给侧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关注释放经济活力和增强生产能力，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也是难点。而对于需求侧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的总需求调控，以货币供应量管理为重点，也有一些以行政性手段直接管理需求侧的局部性政策措施，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而当生产力得到极大地提高时，随着供给侧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需求侧的经济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许多新现象，有些问题甚至是以以往经济学思维难以解决的。

如前文所述，在以往的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下形成的宏观经济管理思维，即凯恩斯主义范式下，总需求中的消费不足现象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的过度谨慎而产生的储蓄过剩。总需求中的投资不足现象主要是由于利率调节失灵。那时由于人们对于货币有特殊的“流动性偏好”，因而倾向于持有货币。因此，需求侧的政策作用就是通过货币政策

① [美]穆雷·N·罗巴斯特：《人，经济与国家》，童子云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26页。

和财政政策的方式增加总需求，降低利率、扩大债务、增加政府支出（投资或消费），等等。

凯恩斯主义认定，人们的过度持币，是由于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直至陷入“流动性陷阱”，无法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刺激需求的作用。因此，认定总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即货币非中性），理论逻辑有其自洽性。但是，在现实中，货币非中性并不仅仅表现为货币具有流动性之效用，人们也不仅因过度偏好于货币流动性而过多持币，而是存在其他更重要的持币动机。最常见的是，许多人对货币有固执的“财富偏好”，将持币额作为“利益”追求和“成功”目标。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囤积货币”，而是追求名义货币的自我增殖，大量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不断自我循环生利，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包括生产和消费）而形成现实需求，从而导致虚拟经济膨胀，金融业的繁荣程度超过实体经济。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因此，货币供应的大幅度增加，债务规模的扩展无度，往往并未显示出需求调控的合意效果。可以说，需求工具严重脱离了经济活动的真实需求侧，货币可能成为不发生需求功能的“体外循环之物”。

现代经济社会中，当货币无限度地追逐脱离消费的财富符号时，货币不仅本身被人们幻想为财富，而且可能涌向具有名义价格增殖性的资产，例如，土地、房屋等，推动其价格“乐观”上涨，成为财富幻想的“显身”，消纳投放出的大量货币。

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在货币囤积（贮藏）和资产持有动机的驱使下，“以钱生钱”演变为“借钱生钱”，而且，“借钱生钱”与“借钱花费”、“借钱投资”相互交织，使经济体中的债务杠杆率越来越高。从理论上说，借来的钱也是购买力，即潜在需求，但借来的钱向何处支出，即购买力怎样实现，对其不同的选择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和后果。当货币没有形成宏观调控者的合意需求时，为刺激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投放，并积累越来越高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几乎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难以避免的趋势。因此，需求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货币流转（以及持有）调控的

系统性政策安排。

应该承认，应对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一方面，货币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对货币作用的理论认识莫衷一是。正如前文所述，有些问题甚至是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所难以应对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指出：“在现实世界中，持有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应付现实中的不确定性。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必知道预期的收益或损失会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估计到恰当的概率之时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估计到所有恰当的概率，那么我们就更没有道理把货币作为一种储备资产。没有人能够通过完美的、功利主义的计算而拥有货币。……总之，新古典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表现一个货币经济。”<sup>①</sup>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调节货币流转（和持有）的政策是不是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赌运气”成分？

当进一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视域下观察和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更要注意其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货币本身的高流动性，加之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作为需求侧力量的货币将发挥复杂的市场效应，一方面，它似乎可以脱离实质经济而自我流转。另一方面，货币毕竟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有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体的“神经”），具有向整个经济体输送养分和提供指向的功能。它居于“需求侧”，汇聚着需求的力量，决定了市场的现实规模即供给的实现能力。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所指出：“由于货币发行失控，市场中的流动性越来越多，泡沫化现象的频率越来越密。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避免投机行为，成为资本市场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监管者而言，怎样避免泡沫膨胀与是否刺破泡沫，则是利益平衡的选择。”<sup>②</sup>当货币在国内国际循环体系中大规模流动时，其经济能量和风险性冲击力同时增大和集聚，而且往往难以构筑有效的海啸防波堤。因此，实质性需求不足和工具性需求泛滥，都是需求侧改革所要面临和应对的重大问题。如何以适当的工具性需求操作促进实质性需求，尤其是实质性消费的持续增长，是现代成熟市场经济需要求解的一个难题。

[责任编辑：李 蕾]

[责任校对：王文秋]

① [美]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② [英]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高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